

关注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深度浸透,圈层文化现象正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我们应当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圈层文化现象呢?

客观理性地看待圈层文化

北京大学网信办主任、原青年研究中心主任 蒋广学

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深度浸透,圈层文化现象正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无论是主动、被动参与或是无意识加入,从大面上说,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方式,绝大部分网民都可以被分入一定的文化圈层,二次元圈、电竞圈、书法圈……每个人因为自己的爱好、职业、性格、特长等被划归为不同圈层,只是有人积极融入,寻求同好,组成圈层,甚至形成“茧房”;有人独自陶醉,选择不主动参与。但不可否认的是,圈层文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形态,涵盖着众多的社会群体,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尤其是高校育人工作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

而回溯中外历史可以发现,圈层现象古已有之。无论是竹林七贤以歌酒会友,还是东林党志于振兴朝政,抑或是阿卡德米自由多元的学术探讨,圈层现象存在于历史的各个阶段、社会的各个领域,只是组成方式、覆盖范围、影响力度不尽相同而已。当前,圈层文化受到广泛关注,成为大众文化现象,则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多种多样的亚文化现象提供了传播便利,从而实现了大规模的普及和扩张。

那么着眼于这一基本背景,我们应当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圈层文化现象呢?

首先,所谓圈层是正常的人性需求。人作为社会性动物,除去自我成长,不可避免要与社会发生联系,受到他人影响,社会交往也是最基本的人性需求。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刻地受到地域、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产生相应的社会联系,如同学、同事等;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突破地域和环境的限制,有共同语言的个体和群体进行交往,这种交流与更深入,也更顺应人们进行人际交往的社会心理,更加贴合人性需求。因此,圈层文化现象是正常人际交往的形式之一,要从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的角度去理解和看待。

其次,圈层文化现象的繁荣是互联网技术支持的结果。圈层文化现象是正常的历史文化现象和变迁变革表现,长期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但由于技术落后和交往成本过高,文化圈层往往受到较多的时空限制。而正是信息革命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人们跨越地域和环境限制提供了极大便利,推动了圈层文化现象的繁荣。圈层文化现象的繁荣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信息社会中海量信息的涌入,使得每个人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呈几何倍数增长,而人的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攫取其中符合自我需求的信息成为必然选择,长此以往,人们往往会深度卷入固有的信息圈层。因此,认识圈层文化现

象,要将其置于信息革命的大环境中,要辩证地看待信息技术给圈层文化现象带来的发展与挑战。

此外,当前圈层文化现象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也与此前的圈层现象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认识圈层文化现象,既要看到其历史传承的一面,更要看到其中的本质性区别。与历史上的圈层相比,信息时代的圈层文化时效性更强,流行文化通过互联网得以快速传播,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接收和传播实时信息,甚至迅速创造全新的亚文化现象;广泛度更大,互联网连接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文化圈层得以大大突破地域限制,分散的区域性圈层得以整合,成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圈层,追星族的“全球粉丝会”就是其中的典型现象;多元性更强,在信息时代,亚文化无处不在,凡事皆可被创造成为亚文化,且以往不被主流文化认可的亚文化也能够被社会包容,圈层文化的内容更丰富、更多元。

而在信息社会中,人们除了主动获取信息,也在被动地接触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夹杂着不同的情感倾向与价值观念,裹挟着消费主义的内核,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也塑造着人们对后续信息的接受,从而导致了信息圈养现象,这是对当代青年主体性的极大伤害。客观认识圈层文化现象,也需要理性辨析,区分清楚良性的圈层文化与被动的信息圈养之间的区别,破除信息圈养的弊端。

对于正常的圈层文化,要秉持辩证态度,鼓励理性发展。具体而言,要加强制度建构,信息时代的文化圈层是自然形成的网络社群,与现实生活中的团体一样需要加强管理,因此要加强网络空间制度法规的建设,完善网络群体管理;要加强文化引导,当前还有很多流行性、浅层性的文化圈层,要推动圈层文化现象的高质量发展,就要引导注意力资源由碎片化信息转向体系化文化,建构文化价值共同体;要构建张力结构,圈层文化现象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压力转移和逃避的结果,因此推动圈层文化的良性发展,也要增强线上、线下生活的弹性,避免虚拟与现实的紧张对立。

而对于信息圈养形成的伪圈层,则要通过教育引导加以尽量避免。对于高校育人工作者而言,要加强网络素养教育,信息圈养体现的是网络信息素养的缺失,因此首先增强青年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培养青年对于信息选择多少、辨别真伪、明晰是非、界定善恶的能力,帮助青年摆脱信息茧房;要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和关怀,帮助青年正确认识集体与个体的辩证关系,使得假独立、伪自我转变成成为真自主;同时要锻造青年主体性,培养青年的认识辨析能力、现实转化能力、主体建构能力和价值塑造能力,以培育网络新青年作为高校育人工作的成才导向。



“被圈层化”的青年文化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罗小茗

当代中国,“青年文化”永远是热点所在。尽管在相当多的时候,与其说它们是由年轻群体的认知、集体行动和文化态度所命名的产物,不如说是媒体和资本携手制造、支配和宣传的结果。当走马灯式的青年文化,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由青年自己创造和定义,反映出年轻人对这个社会的基本态度,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新一轮文化产业竖起的时尚潮流的风向标,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辨析。

让人分外鲜明感受到这一点的,是大学的课堂。几个大学老师碰在一起,常常有类似的困惑。那就是,当我们把媒体上正火的青年文化,拿到课堂和学生们分享时,十有八九,底下的学生一脸茫然,一副淡淡的那不过是“别人家的文化”的表情。这种“别人家的青年文化”,可以显示为流量数据,呈现为媒体热点,却独独无法在几百人的大学课堂上找到几个真正的爱好者和认领者。于是,就好像从未谋面,却永远威胁着你在家长心目中的地位的那个“别人家的小孩”一样,有一种叫做“别人家的青年文化”的东西,也在威胁着青年对于自身文化现实的把握和认知。

也许是为了解释这样一种尴尬,在“宅”、“丧”、“佛系”之后,“圈层化”一词被创造出来说明这一现象。原来那不是什么缥缈的“别人家的青年文化”,而是青年人文圈分门别类、日益精细,彼此之间的公约数几乎为零的文化现状。

这样的解释,自有它的说服力,也颇能引发社会对青年人生活状态的共鸣,比如,社交的小圈子化,多元文化导致的各行其是等等。不过,却始终潜藏着一个危险。那就是,将上述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青年文化”合二为一,指认为同一件事。如此指认的后果是,一旦圈层化的青年文化被确定为一种新型的现实,那么,媒体和资本所做的,不过是为了眼球和利润的迎合之举。而当前文化生产的糟糕状况,也就成了当代青年作为网络原住民的自然结果——都是互联网干的好事。在这个自然的结果面前,我们除了感叹这个时代变得快以外,只能袖手旁观。

然而,圈层化的青年文化,果真只是年轻人天天对着屏幕,闭门造车、疏于社交的

结果吗?各种具体的社会文化机制在此过程中,真的完全不起作用吗?

在这里,仅举一条来自大学的新闻。几乎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读到类似的新闻,那就是大学如何为新生着想,实现寝室的人性化管理。管理的方式不是其他,是根据对学生的调查,安排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相近的同学成为室友。学生们自然很高兴,就此屏蔽了奇葩室友,避免了不愉快的大学生活。家长们也感到欣慰,自己家的宝贝可以和同类人住在一起。校方自然更是倍感轻松,减少了学生之间的矛盾和投诉。殊不知,看似皆大欢喜的人性化管理,同样削减了年轻人在大学期间遭遇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文化的可能性。在这种以避免麻烦为主导思想的管理制度下,学生们恐怕只会越来越依赖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展开自我解释,对不同类型的文化的“挑剔”感到不知所措。

小小的寝室管理制度的变化,自然不会导致青年文化的“圈层化”。然而,架不住大学里各种措施的层层叠加:选课制度、班级解体、奖学金制度等等。更何况,这还只是大学。大学之外,更有整个社会以减少麻烦为主导思想的各种观念在发挥作用。于是,当“讲是非”成为一件费时费力之事,以至于全社会都懒得争辩道理的时候,又怎么能够要求在这样的文化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拥有据理力争、积极沟通的热情?而当实际掌握着教育资源、社会资源的人们,都不愿意挑战技术对于人的诱惑和支配的时候,又哪能指望身在其中耳闻目染的年轻人,对技术有着天然的警觉和免疫力?

至此,可以说,圈层化这样的命名,不过是以“发现”的名义替换问题,以命名的方式转嫁责任。当它以“圈层化的青年文化”替换掉那个悬疑的“别人家的青年文化”,且被当成事实接受下来的时候,整个社会也就只剩下了对不再有公约数的青年文化的无奈,而非何以如此的刨根问底。

接受圈层化之类的命名,不过是青年又一次被挑选出来,为怯懦的长辈们背锅。然而,抱怨和愤怒都是无用的。真正有用的,是看清这样的形势,在长大成人后,彻底抛弃这样的戏码。

学术看台

产权连续谱

王庆明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从产权的社会视角看,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关系之中的,企业与政府(国家)、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三种关系结构以及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国企产权界定的基础。国企产权变革是企业所有权(股权)置换和职工身份置换的“双向过程”,国企产权是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互构的结果,三者共享的社会认知是产权界定的前提。从整体进程看,国企产权变革不是简单的由公到私,而是“不完全产权变革”,位于公私两端之间的是多元复合的产权形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前提下,不同产权形态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一种动态演化的连续谱。身份是国企产权界定以及权利转移的重要条件,无论是企业组织的身份性质还是企业职工的身份等级都对企业的资产归属以及权利边界有重要影响。

现代社会科学的现代性问题

崔延强、卫苗苗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自其诞生即裹挟着相应的现代性风险,启蒙运动、科技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以及牛顿物理学建立将理性主义推到了众人崇拜的地位,现代社会科学中多数学者的建构、研究方法乃至研究范围也都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崇尚理性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历时态看现代社会科学的这些特征是在批判传统或古典学术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进步价值毋庸置疑。然而审视当前,全球化语境下社会科学的现代性症结日渐凸显,成为约束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深层力量。今日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超越自身的现代性困境,消解由工具理性与实证主义等带来的偏狭性,摆脱民族性与国家性的“挟持”,改变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谓“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对立”立场。

社会组织功能和作用

周庆智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中国历史与社会情境下,社会组织是公共体制外的一个存在,它的功能和作用,一是社会的自组织形式,一是国家统治的辅助形式。这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的讨论:一方面,在历史参与者和行动者的理解和观念中,中国社会组织是否应该或只有在国家权力框架下才能获得自我协调和自我建构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组织能否成为连接公共体制与个体的一个中介形式,通过个人之间的自由结社,对公众话语的讨论和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影响或者决定公共体制政策的形成,发挥社会治理主体的功能作用。

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与动力

高江涛在《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上撰文指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界最热门的课题之一。丰富的考古资料,尤其是近年来的新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各区域国家形成过程中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目前至少有“陶寺模式”、“红山模式”和“良渚模式”等。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是指推动国家起源、形成及发展这一演进过程的根本原因,即文明化的动因。对中国早期而言,也是探索文明延绵不断的深层原因或者动力机制。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与碰撞(战争)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外动力;而务实与创新则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原动力,是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人文城市战略与草原文化复兴

刘士林在《开发研究》2019年第2期上撰文指出,文化城市理论作为我国“人文城市建设”的核心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是重建草原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政治型城市化进程中,在经济型城市化进程中,草原地区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经济建设的资源和消费价值。开展文化特色的现代性研究,明确草原文化特色的内涵,建构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传承创新体系,在发展中求创新。开展文化精神的本体性研究,明确草原文化精神的内涵,建构一套符合城市化进程的传播教育体系,在融合中求坚守,在开放中实现振兴。研究民族文化遗产与中华文化复兴的深层节点,正面阐释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探索草原文化在中国和世界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破解生态困境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山东师范大学崔永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诠释与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2BKS063)已于近期结项,评定等级为优秀。该项目从考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社会背景及理论渊源入手,全面、系统探讨其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诠释、重构,并对其得失加以客观的评析。

该研究成果致力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马恩生态思想的诠释与重构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其一,着力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众多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恩生态思想的阐释纳入到“绿色运动”蓬勃兴起、时代的进步要求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视野下加以审视,深刻揭示其思想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其二,该成果从“阐释与重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这一全新视角出发,对其不同时期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作深入系统的探讨,从而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生长点;其三,依据第一手资料,系统梳理与分析研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阐发的“实践中的生态社会主义”(佩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巨大理论力量源自其唯物论(福斯特),以及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生态批判(萨拉·萨卡)等具有启发性的重要思想,以彰显马恩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其四,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审慎地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马恩生态思想的诠释与重构的理论意义、现实价值及缺陷做出了客观的分析与批判。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视诠释、重构马恩生态思想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并加以研究,将有助于克服环境理论家等对马恩生态思想的否定,以及在新近出现的众多国别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再探讨”中真正的马恩被繁复的话语所遮蔽、其原本形象变得日益模糊的现象,从而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其次,系统地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恩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唯物史观等方面内涵的生态思想的深入挖掘与阐释,以及对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处重要地位的确认,有助于克服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忽视其生态理论方面的缺陷,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研究;再次,客观地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批判地吸取借鉴其对马恩丰富生态思想的指认,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肯定,对于当前我国建设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市场与市场精神的经济哲学反思”理论研讨会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邀请函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其特有的运动逻辑彰显出巨大的历史变革力量和主体能动精神。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市场精神对于新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已不仅是一种感觉和体验,而是一个需要积极思考的认识对象,中国已从一般市场精神的培育,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觉探索和实践。与之相呼应的是,学界开始高度关注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文化个性、儒学与儒商、现代儒商精神等热点话题,毫无疑问,这是国内经济哲学贴近中国叙事的学术深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其中,市场精神就是这些特色的典型代表,它既折射出这个时代伟大变革的鲜活经验,又彰显出不断上升的主体原动力,值得人们给予深刻地理论透视和哲学思辨。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拟定于2019年11月16日在安徽财经大学(安徽·蚌埠)召开“市场与市场精神的经济哲学反思”理论研讨会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研讨会定于11月15日报到,11月16日全天会议,11月17日上午会议考察,11月17日下午返程。会议不收取会务费,交通、住宿费自理。

- 会议主题:市场与市场精神
1. 市场范畴的经济哲学思考
2. 市场精神的基本特征分析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精神的比较研究
4. 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认知与概括
5. 其他相关问题
本次会议倡导以文赴会,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优秀论文将推荐给相关核心期刊或编入《中国经济哲学评论·市场精神卷》。论文请发至邮箱 437130405@qq.com 王程 老师收联系电话:18655271768 我们诚挚邀请请您莅临本次大会!

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5.18